

绍兴和议前的 朝|政|研|究

陈忻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绍兴和议前的 朝|政|研|究

陈忻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绍兴和议前的朝政研究/陈忻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5

ISBN 978 - 7 - 5161 - 9950 - 3

I . ①绍… II . ①陈… III . ①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国—宋代
IV . ①D69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206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度建海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75
插 页 2
字 数 243 千字
定 价 8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南宋绍兴和议前的朝臣诗文与政局之关系”
(12YJA751005)

自序

几年前，我在研究宋代洛学派重要人物杨时时，发现他在两宋之交非常活跃，且争议颇多。于是，我翻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及相关学术专著，又细读了这一时期著名历史人物的著述，由此进入一个丰富宽广的世界。当我把这些著述摆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透过历史的眼光再次阅读时，我被它们厚重的内涵所感动。重读以前那些更多地被当作一般性的文学作品的篇章，我为其背后蕴含的历史事实和流溢其中的深挚的情感所震动。

在赵宋朝廷风雨飘摇之际登上政治舞台的李纲，其作品中涉及南宋政权建立之初亟须确立的战、守、和等问题，涉及如何处理参与张邦昌伪楚政权的人员及保证新政实施的久任责成等现实问题；宗泽奏疏中充满声讨汪伯彦、黄潜善主和政策的悲愤，洋溢着切望恢复的激情与愤懑；在时局动荡的南宋初年，赵鼎的政治命运跌宕起伏，其作品中包蕴着澎湃的情感与愤懑悲酸……这一时期的政治人物如吕颐浩、张浚、胡寅等无不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人生，但其作品总的内涵却与一般文人壮志难酬、生不逢时的咏归叹穷迥然不同，在密切关涉纷繁复杂、往复回旋的政治、外交、军事斗争的同时，更反映了那个特定时代的风云及其作

者对具体事件的鲜明态度，展示了政治家特有的责任感、使命感和人格、品性、智慧。

本书的研究时限为靖康之难（1126）的发生到绍兴十一年（1141）绍兴和议签订这一历史阶段。这是一个政治上大动荡、军事上大变化、思想上大纷争的时代。本书以此为历史背景，力求细致地梳理、探讨这一特殊时期与朝政密切相关的朝臣们的作品及其种种表现。

本书避开已经成熟的南宋文人文学的相关研究领域，选择了国家时局动荡、内忧外患严峻的特殊时代作为研究背景，着重探讨南宋朝臣在对外的与金、伪齐的激烈斗争，对内的与叛乱势力的缠斗不休，以及在骄兵悍将的处理等问题上的态度和冲突。两宋之交，宰相的不断更换与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形势相随始终，朝臣的任用与罢免十分频繁，由此导致了各个派系、各种思考、各种言行的产生，而这些思考和言行往往又直接影响到朝廷最终的决策，从而决定了南宋朝廷在此期的走向。研究当时朝臣们的各种思考、言论及其在特定背景下生成的因由和实际效果，对于透彻认识南宋初期的政治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就已有的相关文学研究成果看，对于南宋前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绍兴和议签订之后、政治格局相对稳定的大背景下。至于靖康之难到绍兴和议正式签订之前这一时期，则主要偏重于探讨此期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乱离的悲情，且常常以主战或主和为依据去探讨朝臣的爱国情感。事实上，靖康之难到绍兴和议正式签订之前这段时间是南宋朝廷最危急艰难的时期，朝廷对外、对内的各种斗争及朝臣之间激烈的党派争斗，成为朝臣作品的特殊而复杂的前提和背景，很难用和与战、是与非、对与错做出权衡评判。本书正是通过总体分析和个案研究，期望从政治、军事、文化等角度全面考察此期与朝政相关的朝臣作品，并对其做出恰当的评价，这将对以南宋初期的历史为背景的相关文学研究起到补充助益

自序

的作用。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南宋绍兴和议前的朝臣诗文与政局之关系”（12YJA751005）的研究成果。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郭晓鸿主任的大力帮助和重庆师范大学科研处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陈忻

2016年9月30日

目 录

第一章 建炎元年李纲的“国是”及其失败.....	1
第一节 李纲“国是”之依据：以靖康为鉴.....	2
第二节 李纲“国是”之方向：专务自守	11
第三节 李纲“国是”之失败	17
第二章 从宗泽乞请回銮奏疏看建炎二年南宋朝廷的政治局势	28
第一节 主政者无意北行	29
第二节 南宋军事外交的困扰	40
第三章 从建炎三年朝臣对驻跸地的议论看朝廷的艰危	57
第一节 为宗社计：以钱塘为驻跸地	57
第二节 驻跸武昌之争	65
第三节 被逼入海避敌	72

第四章 从朝臣奏疏看建炎四年南宋朝廷对外对内策略的调整	80
第一节 敝罪立功、有捷必赏	81
第二节 藩镇政策的实施	93
第五章 绍兴元年吕颐浩“先平内寇然后可以御外侮”的策略探讨	102
第一节 “先平内寇”的政治背景	103
第二节 “先平内寇”之政策的具体实施	113
第六章 绍兴二年南宋朝廷艰难的中兴之路	123
第一节 来自外部的伪齐势力困扰	124
第二节 来自内部的南宋朝廷党争	128
第七章 绍兴三年南宋朝廷和战无果的局势	140
第一节 求恢复而无功	141
第二节 就议和而无果	145
第八章 从绍兴四年朝臣奏疏看南宋朝廷的对敌之策	149
第一节 先擒刘豫以定金人	150
第二节 和议乃权时之宜	158
第九章 绍兴五年南宋朝廷“渐图恢复”下的对金态度	166
第一节 善后之计当出群策	167
第二节 待衅以乘乱	171
第三节 既不可因战而废和，又不可因和而忘战	182

目 录

第十章 从绍兴六年宋齐决战看南宋朝廷的困窘	192
第一节 守江与进击的分歧	194
第二节 将帅跋扈、财用堪忧	201
第十一章 绍兴七年南宋朝廷面临的危机	215
第一节 姑息放任而长其骄	216
第二节 任用失当而致其怨	223
第十二章 从绍兴八年的朝臣奏章看宋高宗的疑虑	236
第一节 争论不休的和议之路	236
第二节 渐销将权的必要	246
第三节 高宗对朝臣结党的疑忌	257
第十三章 绍兴九年至十一年南宋朝廷应对金人的举措	267
第一节 积极应对金人的毁约	267
第二节 消解大将的军权	277
结 语	284
主要参考文献	287

第一章 建炎元年李纲的“国是” 及其失败

北宋末年的金人南侵，带给赵宋政权前所未有的危机。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军自东、西两路入犯，“北边诸郡皆陷，又陷忻、代等州，围太原府”^①。十二月，宋徽宗禅位于钦宗。次年，改元靖康，十二月，宋钦宗向金人呈奉降表，靖康二年（1127）二月，金廷“诏降宋二帝为庶人。三月丁酉，立宋太宰张邦昌为大楚皇帝”^②。五月，赵宋的“兵马大元帅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③，历史进入南宋。南宋兴起于国家风雨飘摇之际，外有金人相逼，内有此起彼伏的兵乱、盗乱，如何布画新政，度过艰危就成了高宗即位之初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

李纲正是在这个重要关口登上了南宋政治舞台。建炎元年（1127）五月甲午，“资政殿大学士新除领开封府职事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

^① 《宋史》卷22《徽宗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17页。以下所引《宋史》皆为此版本。

^② 《金史》卷3《太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页。以下所引《金史》皆为此版本。

^③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1册，卷5，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5页。以下所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为此版本。

侍郎，趣赴阙”^①。六月庚申，“诏李纲立新班奏事。执政退，纲留身上十议”^②。李纲所上“十议”，包括“议国是”“议巡幸”“议敕令”“议僭逆”“议伪命”“议战”“议守”“议政本”“议责成”“议修德”，其内容涉及南宋政权建立之初急需确立的战、守、和方针以及如何处理参与张邦昌伪楚政权的人员及保证新政实施的久任责成等现实问题。对于李纲提出的新政，南宋朝廷由支持渐变为放弃。在这个过程中，李纲与拥立高宗的黄潜善、汪伯彦等重臣激烈论争，并于八月罢相，其施政纲领也就随之而破灭了。本章依据这段历史，探讨李纲提出的“国是”的依据、方向及失败的内在原因。

第一节 李纲“国是”之依据：以靖康为鉴

李纲在其所上“议国是”中明确提出“不务战、守之计，惟信讲和之说，则国势益卑，制命于敌，无以自立矣”。他又结合南宋政权刚刚建立、国内外方方面面形势极为严峻的现实状况，在战与守的二策中，选择“自守”作为应对金人南犯的对策和当时的“国是”：“为今之计，莫若一切罢和议，专务自守之策，而战议姑俟于可为之时。”^③李纲所奏的这个“国是”，是以其自身亲历的靖康之际朝廷对金策略不定，战、守、和三者俱失之，最终导致二帝北迁，易姓建号的惨痛教训

^①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1册，卷5，建炎元年五月甲午条，第120页。

^② 同上书，卷6，建炎元年六月庚申条，第142页。

^③ 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58《议国是》，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636页。以下所引《李纲全集》皆为此版本。

为依据的：

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镇之地，许不可胜计之金币以议和，惩劫寨之小衄而不战，和与战两失之。其冬，金人再寇畿甸，廷臣以春初固守为然，而不知时事之异，胶柱鼓瑟，初无变通之谋，内之不能抚循士卒，以死捍贼；外之不能通达号令，以督援师；金人既登城矣，犹降和议已定之诏，以款四方勤王之师，使虏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宝、图籍、仪卫辇辂、百工伎艺，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终也，劫质二圣巡幸沙漠，东宫亲王、六官戚属、宗室之家，尽驱以行，因逼臣僚易姓建号。自古夷狄之祸中国，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之，而卒为和议之所误也……夫国是定，然后设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谋，下无趋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难举也。靖康之间，惟其国是不定，而且和且战，议论纷然，致有今日之祸。则今日之所当监者，不在靖康乎？^①

早在钦宗即位之初，金兵渡河之际，徽宗东幸，“宰执奏事，议欲奉銮輿出狩襄、邓间”。当金人步步紧逼，群臣多以为不可守，钦宗去留之意未决的最艰难时刻，李纲挺身坚持固守：“上顾宰执曰：‘策将安出？’宰执皆默然。余进曰：‘今日之计，莫若整饬军马，扬声出战，团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上曰：‘谁可将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禄蓄养大臣，盖将用之于有事之日。今白时中、李邦彦等虽书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号，抚驭将士，以抗敌锋，乃其职也。’时中怒甚，厉声曰：‘李纲莫能将兵出战？’余曰：‘陛下不以臣为庸懦，倘使治兵，愿以死报。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镇服士卒。’上顾宰

^① 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 58 《议国是》，第 635—637 页。

执曰：“执政有何阙？”赵野对曰：“尚书右丞阙。”时宇文粹中随道君皇帝东幸故也。上曰：“李纲除右丞。”面赐袍带并笏……宰执犹以去计劝上，有旨命余留守，以李棁副之。余为上力陈所以不可去者……上色变，降御榻，泣曰：“卿等勿留朕，朕将亲往陕西，起兵以复都城，决不可留此。”余泣拜，俯伏上前，以死邀之。会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为然，上意稍定，即取纸御书“可回”二字，用宝，俾中使追还中官、国公。因顾余曰：“卿留朕，治兵御寇，专以委卿，不令稍有疏虞。”余惶恐再拜受命，与李棁同出治事。”^① 李纲临危受命，先后任尚书右丞、东京留守、亲征行营使等职，率众坚守东京，“敌兵攻城，纲身督战，募壮士缒城而下，斩酋长十余人，杀其众数千人”^②。金人攻城不下，遂遣使议和。其议和条件则是“须犒师之物，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彩各一百万匹，马、驼、驴、骡之属，各以万计；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悉归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又以亲王宰相为质，乃退师”^③。李纲认为从当时的客观形势看，“固不可以不和”，但不可割地及过许金币，因为“金狄之性，贪婪无厌，又有燕人狡狯以为之谋，必且张大声势，过有邀求，以窥中国。如朝廷不为之动，措置合宜，彼当戢敛而退；如朝廷震惧，所求一切与之，彼知中国无人，益肆觊觎，忧未已也”：

今虏气方锐，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即中国之势遂安；不然，祸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举。^④

然而，李纲的意见得不到朝廷的支持，“宰执皆不以为然，方谓都

① 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171《靖康传信录上》，第1577—1578页。

② 《宋史》卷358《李纲上》，第11243页。

③ 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171《靖康传信录上》，第1581页。

④ 同上书，卷171《靖康传信录上》，第1580页。

城破在朝夕，肝脑且涂地，尚何有三镇？而金币之数，又不足较也。上为群议所惑，默然无所主。凡争逾两时，无一人助余言者”^①。李纲求去，“上慰谕曰：‘卿第出治兵，此事当徐议之。’纲退，则誓书已行，所求皆与之，以皇弟康王、少保张邦昌为质”^②。靖康元年正月“十四日庚辰，皇弟康王、少宰张邦昌使于大金军前，给事中李邺为计议使，右武大夫高世则副之，赍和议誓书，送伴萧三宝奴等同行”^③。宋廷誓书坚称“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违此誓，神殛无赦，宗社倾覆，子孙不享”^④。至此，宋钦宗放弃了“守”的策略，转而以“和”为应对金人的第一要务。

但是，随着数万勤王之师的渐至京师，钦宗朝廷对金人的策略又发生了由和而战的变化。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之“靖康元年正月二十日条”下记载，“京畿、河北路制置使种师道及统制官姚平仲以泾原、秦凤路兵至京师”，“京城人知勤王兵至欢踊，气增十倍”。“上再三慰劳，问计将安出？师道奏曰：‘臣以为讲和非计也。京城周围八十里，如何可围？城高十数丈，粟支数年，不可攻也。若于城上扎寨，而城外严拒守，以待勤王之师，不踰旬月，虏自困矣。然业已讲和，不可止。金银不足，请以见数与之。如其不退，乃与之战。且四镇之地内保州乃宣祖陵寝所在，不宜割与’……又请缓给金带，禁游骑不得远掠，俟其惰归，扼之于河，当使匹马不还。上皆是之。”^⑤

钦宗由先前与金人“金石不渝”的议和之举，随之而转为对种师道反对讲和与割地之说的“是之”，其原因是基于勤王军队的陆续抵达

^① 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171《靖康传信录上》，第1581页。

^② 《宋史》卷358《李纲上》，第11244页。

^③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页。以下所引《三朝北盟会编》皆为此版本。

^④ 同上书，卷30，第220页。

^⑤ 同上书，卷30，第224—226页。

以及对金人剽掠暴行的愤恨：“及勤王之师既集，西兵将帅日至，上意方壮。又闻金人虏掠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后妃、皇子、帝姬坟墓殡殯发掘殆尽，始赫然有用兵之意。”^①以此为背景，正月二十七，李纲上殿奏陈宋金双方的兵力和形势，提出了“以计取之”的方略：

金人之兵，张大其势，然得其实数，不过六万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杂种，其精兵不过三万人。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二十余万，固已数倍之矣。彼以孤军入重地，正犹虎豹自投槛阱亚夫所以困七国者。俟其刍粮乏，人马疲，然后以将帅檄取誓书，复三镇，纵其归，半渡而后击之，此必胜之计也。^②

宋廷对于李纲提出的对敌意见并无异议：“上意深以为然，众议亦允，期即分遣兵以二月六日举事。”但这个计划却又因为姚平仲提前举事而流产。据载，姚平仲“勇而寡谋，谓大功可自有之，先期于二月一日夜，亲率步骑万人，以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谓斡离不者，取今上皇以归”。但姚平仲却不得所欲，劫寨失利，惧诛戮而遁去。李纲遂被指为这次失败的军事行动的主要责任人。“宰相李邦彦于上前语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纲与姚平仲结构，非朝廷议。’遂罢李纲与种师道，遣使交割三镇。”^③其割三镇诏书曰：

敕太原府守臣：应中山、河间、太原府并属县镇及以北州军，已于誓书中议定，合交割与大金事。昨者大金以朝廷招纳叛亡，有渝信誓，因举大军，直至京畿。重以社稷为念，所系甚大，遂割三府，以寻欢盟。庶销兵革之忧，以固两朝之好。其犬牙不齐去处，

① 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171《靖康传信录上》，第1583页。

② 同上书，卷172《靖康传信录中》，第1587页。

③ 同上书，卷172《靖康传信录中》，第1587—1588页。

并两平兑易，合照誓书施行。如有州军未便听从，仰将此诏书遍行告谕，各务遵禀。毋或拒违，自取涂炭。

两朝封疆接畛，义同一家，各宁尔居，永保信睦。^①

钦宗朝廷既已满足了金人的索求，意欲“割三府以寻欢盟，庶销兵革之忧，以固两朝之好”，金人遂退师北还。宋廷也罢去诸道勤王之师，就此进入“和”的时期，二月十二戊申大赦天下。至此，钦宗朝廷的对金策略又由战转变为和。

但是，朝廷上下的反和之声并未因议和而停止，太学生杨诲上书论反对割地、晁其上书论三镇不可弃，其言辞皆激烈慷慨。御史中丞许翰更深入分析了割让三镇的危害及姚平仲劫寨失利的原因，明确提出议和乃非策：

方今若失三镇二十州之地，则天下之势已断。西北无河东，则陕不可守；无河朔，则汴不可都，计不过谋渡江南。臣考永嘉渡江能为东晋者，乃王导、谢安英贤相继，扶危救倾，仅能立国，而中原丘墟，遂陷胡貊。后世无王导、谢安之才，或有而不见施用，则东晋割据，犹恐未易为也。……今使虏不释憾，则渡河之师当战，战则必有漕运之役，有应援之兵，有屯据之要，皆当素治，不计小节，但责成功，而后将帅志一，士卒气奋，三镇之守，有死无二。若我将以疑遣，师以苟行，则精锐已亡，何以取胜？凡今为和议者，苟取目前之无事，则又未可必也。臣闻西北之民人人相语曰：“吾属与其为虏，则宁南向作贼，死且为中原鬼。”使三镇之众发愤怨怒，人为寇攘，非小变也。故姑息目前，亦未易得。况又方来之

^① (金)佚名编，金少英校补，李庆善整理：《大金吊伐录校补》之《宋少主敕太原守臣诏》，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62页。以下所引《大金吊伐录校补》皆为此版本。